

# 關於徐渭書畫自用印與書畫編年

荒井雄三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日本東洋美術史講師

## 一、著眼點

### (一) 徐渭書畫研究的基礎

徐邦達先生，在關於《青天歌》卷的論爭中，有這麼一段很有意思的敘述。“關於印章問題，我們也早已經發現過元、明時代的書畫中，有本身皆真而印章卻大同小異、似是實非的情況。鄭為同志曾告訴過我，在上海附近發掘過明墓二座，在墓中出現了印文大同小異的印章幾套。原來當時人刻用印章有此習慣，才打破了這個啞謎。”（徐邦達 再論徐渭書《青天歌》卷的真偽，《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文章裡談到明朝人“大同小異的印章”，這些印不見得全部都是偽印，擁有“印文大同小異的幾套印章”，乃是當時明朝人的習慣。這不僅適用於徐渭，進一步說，徐渭更有押蓋具特殊特徵印章的習慣。

因此，筆者認為必須從書畫本身，來對徐渭多樣性的詩書畫世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而這樣的一個研究，不管是對於作品真偽的判斷或徐渭書畫作品裡少數有紀年作品的編年等旁證，亦是不可欠缺的。

既然是徐渭書畫的基礎研究，筆者全面性網羅目前可搜集到的徐渭書畫資料，利用數位化影像將自用印分類並作了系統性的研究。在廣泛搜集圖片資料過程中，去除了明顯已被公認的偽品，再將很難判斷真偽的作品及一些臨摹本、但對徐渭書畫研究有幫助的作品等，共網羅了書畫作品兩百多件。其中，把圖片看起來比較清楚的一百五十多方印，給予影像數位化，進行了比較分類、用法、印文思想的分析。本論文即為其中成果的一部份。

### (二) 印的調查

#### 1. 徐渭的初步基準印

以《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裡上海博物館藏等七十個例子，加上“明清畫家印鑑”裡歐美所藏的十四個例子為此研究的基準印。此外，《文人畫粹編·第五卷：徐渭、董其昌》裡曾談到但前舉兩書所沒有的日本和美國三十五個印例亦為此調查的基準。這裡所謂的基準，因為並不是所有印都適用，指的是在初步研究階段上的一個比較基準的意思。而這個工作也順道把印的收藏處、作品名不詳的部分弄清楚了。



#### 2. 印跡的比較·分類

前提基準例的比較和分類，主要是透過電腦畫面，把兩個印用數位方法，透過畫像放大，將之重疊對照。這比用肉眼來對照兩個圖像應該更為客觀。一些較小的圖像經由放大而產生的變形，在處理時會小心注意。因押印時所造成的差異以及畫布後面的損傷，所造成印面的脫落或是絹布在裱褙時產生的扭曲等地方也會慎重處理。

#### 3. 整理號碼的標注方法

- (1) 在整理時，為了避免發生新的混亂，將沿襲《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裡所使用的印的號碼，並在印文後面標注整理號碼。
- (2) 從《文人畫粹編》裡引用，而《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所沒有的印，則在後面加注B。
- (3) 同樣的印文，不過印面有些許差異、明顯不同的則在整理號碼後加注從a開始的小字母。大小的不同，譬如長度上偏長的，則在號碼後添加如“長”“圓”等適當文字。
- (4) 印形相似，但因為插圖的關係而很難辨別的，則在整理號碼之後添加（ ）。希望可以藉由今後的研究，將這問題予以明白化。

## 二、徐渭的用印

元朝的王冕（1287？ - 1359），以擅長畫梅而馳名，也是號稱第一個使用花乳石自刻印蓋在畫上的人。關於王冕的事雖然有很多僅是傳說，不過大約是這時候開始漸漸往吳昌碩（1844 - 1927）等代表清時代末期詩書畫篆刻一致的世界展開，漸受注意。徐渭對於生長在浙江省紹興附近的諸暨人王冕非常重視。徐渭在《擬鶯圖》卷裡把自己比擬為與王元章唱和的詩有八首。想必徐渭當時也注意到王冕墨梅畫裡的印和布置方法吧。

到了明代，在鈐印方面更注重意的表現，且有比元代更強烈的趨勢。明代的特色是比朱文印要求線條的建構性外，在放逸較易於表現的白文印的質量上都更多更好。不過書畫家自己刻印的情況仍少，大部分還是倚賴篆刻師傅為他們刻印。

在徐渭的四十種印文裡，朱文不超過十二種，白文居多。這些印不同於王冕，應該都是篆刻師傅所入刀。不過其中可能也有徐渭的朋友沈明臣（字嘉則。著有《豐對樓詩選》

(《四庫全書目叢書集部》第一百四十四冊所收)、公元一五七二年顧氏《集古印譜》序、一六零八年《明臣印譜》。)、林穆所刻的印章。徐渭也和朋友一樣，對於印章的使用花了不少心思吧。例如以上海博物館所藏《擬鸞圖》卷為例，在一件作品上蓋了十四個印，這樣的表現我們沒辦法說他對印沒有絲毫熱情。接下來我們將談一談這些印的特徵。

### (一) 印文種類

關於徐渭有許多的字號：

字文清，之後改為文長。

號天池、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道人、天池道士、天池漁隱、天池中漱犢之輩、青藤、青藤老人、青藤道士、青藤居士、漱者、漱仙、漱老、漱仙老子、田水月、佛壽、金壘、金壘山人、鷺鼻山儂、鷺鼻山樵、黃鷺道士、孺子、山陰布衣、鵬飛處人、白鷗山人、方蟬子、方蟬道人、大環、大環道人、蒼筤中人等。書齋名有青藤書屋、一枝堂、酬字堂、梅花館、櫻桃館等。(金壘是上虞金壘山，《參同契》的魏伯陽煉丹故地。)

字號多印文當然也就豐富起來。以下，將舉出印文和之前所提在書畫調查上所統計過的使用頻率。此外，比較能夠表達出作者心境的閑章印(與姓名字號無關的印。如雅印、游印之類)較多，這也是一項特徵。

#### 1 姓名印與字號印

徐渭之印(小)二十八例、徐渭之印(大)三例、徐渭之印(朱文)三例、徐渭私印(朱文)十例、徐渭印九例、徐渭九例、渭文長(組印)六例、徐渭漱仙(朱白文連珠印)三例、徐氏文長一例。

文長(朱文)四十二例、文長二十八例、文長氏十八例。

天池山人六十五例、天池山人(朱文)二例。

青藤道士六十例、青藤一例、青藤道人一例。

漱仙二十五例、天池漱仙十九例、金壘山人十九例、田水月六例、天池四例、秦田水月三例、古秦田水月二例、徐田水月(朱文)一例。

佛壽十九例、孺子(朱文橢圓)十一例、墨三昧九例、孺子一例。

#### 2 齋室印與閑章印

湘管齋(朱文)五十八例、公孫大孃二十六例、袖裡青蛇二十四例、海笠十一例、華暗子雲居十一例、青山捫虱十例、酬字堂(朱文)六例、山陰布衣五例、鳳飛處人五例、太玄箸六例、與木石居三例、兩溟魚鳥二例、辛卯七十一，二例。

之眾山人、龍啞大家公、筍孤、天放狂夫、石鷗館，各一例。

#### 3. 印文不明印

“抱風弄月”、“八百里荷花中人”、“印文不明白文印”、“印文不明白文印”，各一例。

### (二) 徐渭用印的特徵

1. 大約四十種印裡，朱文有十二種，白文較多。

2. 閑章印等使用於畫的印較多

(1) 祇有在畫作才看得到的印：徐渭之印(朱文)、孺子、田水月、徐田水月(朱文)、天池、渭文長、徐渭漱仙(朱白文連珠印)、秦田水月、古秦田水月、青山捫虱、鵬飛處人、太玄著、辛卯七十一、石鷗館、青藤道人、青藤、孺子、(抱風弄月)、筍孤、龍啞大家公、天放狂夫。

(2) 祇有在書法作品才看得到的印：徐氏文長、之眾山人、八百里荷花中人。

(3) 書畫兼用印：上記以外諸印。

3. 鈐印用法之定型和非定型

(1) 定型：名字款識下面押蓋姓名字號的印，從一方到數方，畫的話在角落押蓋一方閑章印、書的話在引首處押蓋一方閑章印。

(2) 非定型：押在一般作品右下角押鑑藏印的地方，比如“湘管齋”印的幾個例子，還有廣東省博物館藏《行草書淮陰侯祠卷》“華暗子雲居”印、佛利爾美術館藏《草書詩翰卷》“徐渭”印等。也有把“湘管齋”印當騎縫印使用的例子。

畫卷裡，在複數的主題和題詩相互作用的情況下，一件作品裡印的種類也增多。如上海博物館所藏《擬鸞圖》卷有十四個印等。

## 三、徐渭各個用印的特徵

以下將舉出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印。在這裡，困擾著我們眼睛的，如前文提及徐邦達論文中談到的，印文雖然一樣，但是印面卻有些微的差異。例如，與徐渭同處明代的沈周也有大批相似的“石田”印，這都增添了我們在鑑別上的難度。

徐渭也有許多相似的印。不僅如此，透過此次全面性網羅調查的結果，發現這些印是一套一套的，在使用時，有不太與其他印混著使用的特徵。接下來，就印的個別特徵，以“天池山人”、“公孫大孃”和“湘管齋”印為例來說明。

### (一) “天池山人”印

天池指的是徐渭出生長大的留花書屋（青藤書屋）的庭院。這個印在徐渭各個時期都有使用，是他最愛的用印之一，這次調查裡，有六十五個例子，也是最多的。印面富於變化，這些“大同小異的用印”，如天池山人21小、天池山人長、天池山人34、天池山人34a、天池山人35、天池山人51、天池山人65等。

以下，將舉出典型的例子。

天池山人36



上海博物館所藏著名的山水人物畫卷《擬鶯圖》卷裡押有此印。其他如萬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徐渭五十五歲，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花卉雜畫》卷和前衛作風的上海博物館所藏《花果卷》裡也看得到。

天池山人36a



從左邊開始是，佛利爾美術館所藏《花卉圖》卷，接著是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所藏《墨芭蕉圖》的例子。這個印，乍看之下，可能跟天池山人36較難辨別，不過從“山人”兩字的間隔或者是“池”字末筆的曲線可以看出其中差異。《墨芭蕉圖》文采郁郁的筆調，出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是早期的作品，這又是此次調查中有趣的發現之一。

天池山人34



天池山人34印為最晚年書畫的基準，從“支那南畫大成”裡《水墨花卉》卷所擷取下來。目前還無法確認收藏者是誰。與天池山人36印系統不同的差別在於，以“天”字的左邊為基準，“池”字三點水中央的直畫來看，36是往右傾，34是幾乎和“天”字的線齊平的。

其他的例子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徐渭去世前一年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的《墨花九段》卷，或榮寶齋所藏，同年的《花卉圖》卷。書畫的筆調作風方面較為協調，用筆也較為老熟，呈現一種圓熟的雅趣。書法作品的話，蘇州博物館藏，長近三米五大捲軸草書的代表作之一的對幅《行草書應製詞詠劍》和《行草書應製詞詠墨》裡也看得到此印。這印可以補充說明這幅大軸是徐渭最晚年大軸草書的佐證。此印有較多的例子，是符合徐渭在晚年時，困窮潦倒賣書畫維生的傳聞。

天池山人34a



天池山人34較多的例子裡，大概也包含有些偽印，正因為印文“大同小異”，反成為困擾我們的要素。天池山人34a是從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徐渭行草代表作《行草書杜甫秋興八首》冊中擷取而來。

在這，我們使用數位畫像試著把天池山人34和天池山人34a兩個重疊作比較。雖然四個角的邊緣和“池”字有些微的差異令我們在意，不過為了不影響進度，我們先假定兩者為同一印。值得注意的是，天池山人34的右上方，“天”字第一筆右上方的缺角和印的左上方，“山”字左邊的缺角。這並不是押印時湊巧造成的一時的缺角，而是經年累月的因為某種理由所產生的自然的缺角（相對的，筆者認為此系列“天池山人”印中的“天”字第一筆左上方的痕跡則是人為造成）。這方印用到產生缺角，可以相信為長久以來所被愛用的一方印吧。若兩者為同一印，可以想像時間是從天池山人34a往天池山人34進展。

押蓋天池山人34a主要的作品是有徐渭晚年書齋“櫻桃館”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自書詩》卷、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蟹魚圖》卷，還有給人如老年燈火般印象、畫中有紅色石榴果實、最接近晚年書風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花圖》冊，此外，萬曆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徐渭七十一歲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卷裡也看得到。我們可以利用印的缺角，將這些作品群往有天池山人34印的作品群移動，來推算出書畫的編年。

在天池山人34a往天池山人34推移時，可以想像缺角發生的時期。天池山人34的兩個缺角裡，有祇有左邊缺角的印，如果把這個當做是天池山人34b的話，紹興市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九一年春的《春興詩》冊、還有榮寶齋所藏公元一五九二年八月十五日《行書煎茶七類》卷裡押的印就符合天池山人34b的條件。



中間的兩個例子是天池山人34b，左邊的印是公元一五九二年春《春興詩》冊裡的印，右印是公元一五九二年八月十五日《行書煎茶七類》卷裡的印。從

“天池山人34a（無缺角）

公元一五九一年春，天池山人34（左邊缺角）

公元一五九二年秋以後，天池山人34（左邊加右上邊缺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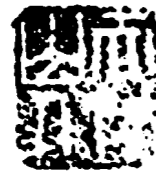
這個流程來看，可以想像“天池山人34”印有系統的變遷。若此推論正確，則蓋有天池山人34的書畫作品即為徐渭最晚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晚秋開始到隔年去世之間的創作。

天池山人34c



天池山人34c印押在公元一五九二年春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絹本《論書法》卷和《行書畫錦堂記》。

天池山人51長



天池山人51長印押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山水人物花卉圖》，是公元一五八八年的基準印。

天池山人51



天池山人51印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從曹澄墓裡出土的《草書青天歌》卷的落款下方的印，關於此作品，有先前引用的徐邦達和鄭威的論爭。印文的話，可以說此印乃為一孤印，除此之外並無其他例子。

## （二）“公孫大孃”印

此印據說是從唐代草書大家張旭在觀看公孫大孃舞劍時頓悟出狂草奧妙這段佳話而來。喜歡劍的徐渭也喜歡這一軼事吧。除了印之外，還有“張旭觀公孫大孃舞劍器”詩一首（《徐文長三集》卷五，第一五九頁）。

公孫大孃B29



公孫大孃B29a



公孫大孃B29是從常常舉例的佛利爾美術館藏《花卉圖》卷中擷取，公孫大孃B29a則是從畫風端莊的《榴實圖》裡擷取。兩印在“孫”字的系的地方，利用三角形組合而成，兩者相比對，公孫大孃B29a的長度較短。前者由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本的《墨芭蕉圖》裡看到，後者則祇能由南京博物院藏的《三清圖》裡看到。

公孫大孃65



公孫大孃65“孫”字的系，呈現一個圓“8”字形，為其一大特徵。此印是從此次展出的徐渭行書代表作品、上海博物館藏《女英館十詠》卷擷取而來。其他也有廣東省博物館藏《淮陰侯祠》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草書千字文》卷、紹興市博物館《行書五律詩》（浙18-006）和重慶市博物館藏《草書自度曲》等例子。

公孫大孃63



公孫大孃63印的“孫”字，此印特徵在於系是由兩個方形所組成，和子之間有點距離。此印由萬曆八年（公元一五八零年）徐渭六十歲落款的上海博物館藏絹本《行草書陶詩二

十首》卷裡取得。其他可以舉出如在天池山人34a所談到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秋興八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花圖》冊，還有臺北故宮藏徐渭畫軸裡最大的三公尺三十八公分長的《花卉十六種圖（花竹圖）》等可以看出徐渭從中年到晚年不同作風。

公孫大孃63a



公孫大孃63a印在天池山人34b裡早已談過的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有秋仲落款，榮寶齋藏絹本《行書煎茶七類》卷裡取得。其他還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雜畫》卷，廣東省博物館藏《花卉圖》裡可以看出晚年作風的作品。

此印也可以看出印的缺角。在右上方“公”字的右邊筆畫有一缺角，如果公元一五八零年公孫大孃63和公元一五九二年公孫大孃63a兩印是相隔十二年之後所蓋的同一個印的話，那麼就像在天池山人34裡談論到的：

“公元一五八零年，公孫大孃63（無缺角）  
公元一五九二年秋，公孫大孃63a（右上缺角）”。

由此可以推論出“公孫大孃63”印有這樣一個系統化的變遷。

### （三）“湘管齋”印

用瀟湘的斑竹作成的筆管，也就是筆，借來引用為書齋的名字。在徐渭自用印中是最大的一方印。誠如已經在上文關於徐渭用印的特徵裡討論過特殊用例，我們可以知道對徐渭而言，“湘管齋”印和其他印比較起來是一個特別印。

湘管齋L



湘管齋68圓



湘管齋68



湘管齋68a



湘管齋69



湘管齋70



湘管齋70a



湘管齋70b



湘管齋L押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榴實圖》，其他有南京博物院《三清圖》的例子。

湘管齋68圓押在佛利爾美術館藏《花卉圖》卷，跟湘管齋68較接近，“管”字“臣”部右下角等作圓。其他有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本的《墨芭蕉圖》、紹興博物館《行書寫花十六種詩》卷（浙18-003）的例子。

湘管齋68長36×37毫米（mm），為徐渭中晚年書畫作品中的基準印，從“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裡《行書詩》卷的例子。其他也有上海博物館藏《行書女英館十詠》卷、《花果》卷、紹興博物館藏《行書五律詩》（浙18-006）、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草書春雨詩》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葡萄圖》等例子。

湘管齋68a印的“齋”字左邊下縱畫和左緣欄中央產生不連續，線條缺了一部分。此印由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冬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卷裡取得。其他也有公元一五九二年秋仲落款的榮寶齋藏《行書煎茶七類》卷、公元一五九二年秋八月落款

的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圖》卷、《五月蓮花圖》、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雜畫》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四時花卉》卷、瀋陽故宮博物院藏《蔬果》卷、佛利爾美術館藏《行書觀潮詩》等徐渭最晚年書畫的例子。

湘管齋68和湘管齋68a兩印是同一個印的話，那麼就像在天池山人34和公孫大孃63裡談論到的：

“湘管齋68（無缺）

公元一五九二年秋以前，湘管齋68a（‘齋’字左邊等缺損）”，

可以推論出“湘管齋68”印有這樣一個系統化的變遷。

湘管齋69押在公元一五八零年八月望日落款的上海博物館藏《雜畫》卷，其他也有公元一五七五年菊月望日落款的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花卉雜畫》卷、上海博物館藏《牡丹蕉石圖》、公元一五四二年偽款的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等例子。

湘管齋70押在上海博物館藏《行草書李白詩蘇軾詞》卷，其他有公元一五八零年落款的上海博物館藏《行草書陶詩二十首》卷等例子。

湘管齋70a押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秋興八首》冊，其他有公元一五九二年春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絹本《論書法》卷和《行書畫錦堂記》等例子。

湘管齋70b押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公元一五九一年《墨花十二段》卷，其他有晚年書齋櫻桃館落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絹本《自書詩》卷等例子。

#### （四）其他：有助於編年的自用印

以下乃是對於編年有幫助的線索之印章。

1 “酬字堂”印是寫了“鎮海樓記”以後，公元一五六一年秋以後押蓋的印。

2 “辛卯七十一”印是，辛卯年，徐渭的生日、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二月四日算起一年內，或者是之後才押蓋。

## 四、群組的“套印”

在收集整理徐渭的印時，發現到一個重點，就是在用印方面，他會有一組一組的印，而且在使用時，組與組之間不太混著使用。以下將分成十組（A至J組）來探討。

A. 佛利爾本《花卉圖》卷組：徐渭之印B5、天池山人36、湘管齋68圓、青藤道士B17、文長B14、文長B9、公孫大孃B29、文長氏B15、華暗子雲居31a、天池漱僊B19、袖裡青蛇B26、

青山捫虱B28、渭B7、徐渭之印B2、徐渭B1、秦田水月B35、古秦田水月B34、山陰布衣B22、酬字堂B32。

（作品例：佛利爾美術館所藏《花卉圖》卷、火奴魯魯美術館藏《花卉圖》卷、紹興博物館藏《行書寫花十六種詩》卷（浙18-003）、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藏《墨芭蕉圖》、紹興博物館藏《行書五律詩》（浙18-007）等。）

B. 隆慶年間《草書春雨詩》卷組：徐渭之印13、之眾山人38、天池漱僊T。

（作品例：上海博物館藏《草書春雨詩》卷、虛白齋藏《行草書詩天瓦庵》等）

C. 田水月（圓印）群：田水月66a、天池67a。

（作品例：遼寧省博物館藏《寫意草蟲圖（葦塘蟲語圖）》等。不包含田水月66、天池67的上海博物館藏《雜花四段》卷。）

D. 《榴實圖》群：徐渭印11、文長B9a、湘管齋L、袖裡青蛇B26a、天池漱僊32、公孫大孃B29a、徐田水月（朱文）。

（作品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榴實圖》、南京博物院藏《三清圖》等。而遼寧省博物館藏《菊花圖》的文長B9b印是類似文長B9a的偽印。）

E. 《擬鸞圖》卷和《花果圖》群：徐渭12、天池山人36、青藤道士B17a、袖裡青蛇56、公孫大孃65、文長10、文長28、渭1、文長2、佛壽17、秦田水月24、鵬飛處人30、青山捫虱42、華暗子雲居31、漱僊55、兩溟魚鳥44、山陰布衣61、金曇山人53、湘管齋68。

（作品例：佛利爾美術館所藏《草書詩翰》卷、上海博物館藏《行書女笑館十詠》、上海博物館藏《擬鸞圖》卷、上海博物館藏《花果》卷等。）

F. 公元一五八零年萬曆庚辰《花果魚蟹圖》卷群：徐渭之印22、徐渭之印64、天池山人36、青藤道士62、湘管齋69、文長29、袖裡青蛇19、太玄著4、文長氏6、青山捫虱42、華暗子雲居16、天池漱僊15、黑山味23、孺子B25、抱風弄月。

（作品例：上海博物館藏公元一五八零年萬曆庚辰《花果魚蟹圖》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五七五年《花卉圖》卷、上海博物館藏《牡丹蕉石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楷行書自書詩楚秋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花鳥》卷、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等。）

G. 公元一五八八年《山水人物花卉》冊群：祇有徐渭之印21長、天池山人51長

（作品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萬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山水人物花卉》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黃甲圖》等。）

H. 住友本公元一五九一年《花卉雜畫》卷群：文長B8、渭B6、文長B10、徐渭印B3、徐渭、青藤道人B18、筍孤（白文）、孺子B24、天池（白文）

（作品例：祇有泉屋博古館藏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花卉雜畫》卷。）

I. 支那南畫大成本《水墨花卉》卷群：徐渭之印54、天池山人34、天池山人34a、天池山人

34b、天池山人34c、青藤道士58、湘管齋68、湘管齋68a、湘管齋70、湘管齋70a、湘管齋70b、袖裡青蛇56a、公孫大孃63a、文長48a、文長27、漱僊49、佛壽18、金壘山人57、海笠20、太玄著41、辛卯七十一47。

(作品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墨花九段》卷、同年榮寶齋藏《花卉圖卷》、蘇州博物館藏《行草書應制詞詠劍》、《行草書應制詞詠劍墨》、榮寶齋藏公元一五九二年《行書煎茶七類》卷、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雜畫》卷、廣東省博物館藏《花卉圖》等，表現出中期至最晚年作風的作品。)

J. 浙江省博物館藏《花卉》冊群：徐渭之印21小、天池山人51小、天池漱僊32a、徐渭漱(連珠印)、文長氏25、文長B9a、孺子B25、青藤道士(?)、袖裡青蛇(?)。以上分組有點繁雜，但為本研究主要群組。

#### (一) 各群組分類時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在歸納所屬各組作業時，有些東西實際上需要更細微的判斷，還有可能有遺漏或判斷的錯誤。此外在各群組裡舉出的例子中，當考慮“印-書畫”相對獨立關係性的問題時，就算是真印，作品本身有疑問的例子也會出現。這就要思考是否為徐渭的代筆作品，比如史槃、王圖、王玉陽、柳元穀、馬策之、陳于朝、王驥德、王澹、吳系等的代筆。進一步，今後對於一個群組全體，是否群組本身即為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也要納入考量。

群組A：這些作品群是否為真蹟、真印，是否為代筆人(王圖、王玉陽等)，筆者目前的想法是還有探討的空間。筆者個人認為，把佛利爾本《花卉圖》卷的題款書法一字一字拿出來對照之後和其他群組在點畫線質上並無相似處。有一說是徐渭早期的作品，但書法不是徐渭的，火奴魯魯本等也一樣。但斯德哥爾摩本《墨芭蕉圖》的書畫、紹興市博物館藏《行草書麗人詩》書法共有力而有特色。

群組B：榮寶齋所藏《行書捧讀》手卷的徐渭之印13的線質比較生硬。此原因甚麼？

群組C：用田水月印(圓印)作品偽作較多。要區別後人(張大千等)所做的作品。

群組D：傅申先生提交遼寧省博物館藏《菊花圖》是張大千偽作，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榴實圖》值得懷疑。前圖擬後圖的印(文長B9b印做文長B9a)補充此說。

群組E：有些學者懷疑這些群組裡的某個書畫，筆者目前的想法是徐渭的多樣性包含群組E。筆者認為此群組E是徐渭長期旅行時隨身攜帶的一組印。上海博物館藏公元一五八零年《花果魚蟹圖》卷是八月十五日在北京所書寫的作品。不過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的嘉靖壬寅(嘉靖二十一年，公元一五四二年)落款，可以明顯看出錯誤。因此筆者判定此一作品為偽作，或是代筆人(柳元穀、馬策之等)作品，仍有待詳加考證。

群組I：這些群組裡的某個書畫是否為代筆人(史槃、陳于朝等)或為後人(張大千

等)的作品還有探討的空間。還有一些偽印。

群組J：是否真蹟、真印，還有探討的空間。

#### (二) 其他無法分組的孤印

因為祇有一個例子，而無法分組的書畫作品如下：

“徐渭之印”朱文印、“中子”印、“翁州居士”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公元一五六七年隆慶元年款《青藤自書詩文冊》。

“天池山人”印，柏林東方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七零年隆慶四年《寒林四友圖》。

“徐渭之印22小”印、“文長7”印，上海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七零年《行書杜甫詩》扇頁。

“徐渭？”連珠印，上海博物館藏《行草陽和廷捷詩》扇頁。

“徐田水月”朱文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驢背吟詩圖》。

“徐渭之印21”印，南京博物院藏《雜花圖》卷。

“文長”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行書自作次張長治韻七律詩》。

“天池漱僊”印、“徐生渭”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行草書自作龍溪子七言古詩》。

“石鷗館43”印，上海博物館藏《漁婦圖》。

“墨三昧(小長)”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梅花蕉葉圖》。

“青藤道人”印，上海博物館藏《草書書簡“得書後即走筆”》(這封書信“此”字的結構或點向右上跳躍這類的筆畫，在徐渭書法裡未曾見過)。

“文長45”、“徐氏文長5”、“青藤道人50”各印，劭厚夫藏《為內惺補智絃詩》卷。

“天池山人196a9”、“太玄著40”、“青藤道士196a11”、“湘管齋68b”各印，個人藏《稻蟹圖》。

#### (三) 未列入考察對象的書畫作品

有些曾被介紹過較有名的作品圖版，可以明顯看出是徐渭之後的書畫用印，為了避免繁雜，從本次自用印考察中排除。以下即為其例：

鎮江市博物館藏公元一五五四年款《草書四言聯》

上海博物館藏《雜花四段》卷

廣州市美術館藏公元一五六一年款《花卉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潑墨十二段》卷

榮寶齋藏《潑墨四段》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花卉圖》冊八開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藏《行書煎茶七類》卷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行書七絕書》冊十開

日本菊池家舊藏《雜畫》冊三十六開（已經全部燒燬？）

#### （四）各群組間擁有許多印的理由

各組之間擁有各式各樣印的原因之一，是徐渭依照畫卷的形式，隨著題詩不同而變換印文。再來就是，全部的印並非同時使用，而是主要的印之外，加上當時的感覺，在適當的群組裡找出適當的印押蓋。

##### 1. 群組化成立內在的理由

這樣一套一套的群組印，似乎有它成立的內在理由。

群組C、群組D，田水月和《榴實圖》的群組裡的繪寫物體，在徐渭書畫裡，就有如楷書一般是較為端正畫法的較多。

群組E，《擬寫圖》卷和《花果》卷群裡，可以看到充滿活氣的徐渭，用了許多“孺子”印（孺子指的是小孩子，象徵著“童心”），時而像《花果》卷般前衛。

群組F，公元一五八零年萬曆庚辰《花果魚蟹圖》組，畫作多用沒骨暈染法，書法方面則多用像鐵釘頭一般打入的寫法，於畫於書都顯現出與其他群組不同的變化。

##### 2. 群組化成立外在的理由

群組成立外在的要因，或許可以歸因於徐渭一生中，由於應付人生中各種不同的狀況。請求某個篆刻師傅刻的一套印章在某個時期使用也不一定。徐渭一生中搬了許多次家，加上如入獄這樣激烈的環境變化，還有在出獄以後書畫創作活動增加，從公元一五七三年到一五八二年期間在外旅遊的時間也變多。在那情況下，一套印如果不見，可能就會重作一套印來補也說不定。隱居在紹興的公元一五八二年以後，意外減少，特別是晚年定位在群組I，支那南畫大成本《水墨花卉》卷群組裡的印也就持續在使用。

## 五、群組的大致編年

### （一）書畫編年研究

在這稍微簡單地談論一下“以徐渭自用印所做的書畫群組編年圖”（參看本文最後附圖）。

縱軸是從公元一五六零年到徐渭去世一五九三年為止的時間體系。現存可以信賴的作品大多數集中在此一時期。橫軸的左邊是畫，右邊是書法作品。從作品量來說的話，書和畫遺留下來的作品量大致相同，不過從印章的種類來說的話，擁有押蓋在題畫詩的印，比例上畫是比較多的。實心圓所代表的是各個群組，以藍色系和紅色系的顏色來作區別（從某群組往上下延伸同樣色系稍微淡一點的非實心的半橢圓代表群組內的某個印在那裡出現）。圓重疊的部分代表某個印出現在兩群組間。

另外，圓的背景是徐渭一生中所發生的事，對於他的創作不無影響的入獄期，五次前往北京（最後一次祇到中途未能成行），以及赴北京時生了五次病，各次的大概時間利用不同顏色上圖。

### （二）大致的徐渭書畫編年

目前要很嚴密地去劃分現存徐渭書畫作品的年代是困難的。以下為今後研究徐渭書畫的時期及整體輪廓建立假設。如下：早期：(A)BC 中期：DEF(I) 晚年：GI 最晚年：HI（這裡所說的早期指的是現存作品中較早期的意思）。

早期：入獄期間（嘉靖四十五年至隆慶年間，四十六歲，公元一五六六年 - 一五七二年）的前後數年。書畫停留在某種青澀階段。

中期：萬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五十五歲，徐渭完全被釋放之後到萬曆十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六十六歲，因為精神失調的原因，從北京回家鄉前往王道翁家穩定下來這段時間。書畫上可以看出有許多的嘗試的時期。

晚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左右開始到停留在紹興王家建置書齋之後，幫助徐渭從獄中釋放的張元汴在這時期去世。書畫呈現圓熟的時期。

最晚年：特別是有紀年作品大量增加的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七十一歲左右開始到萬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七十三歲去世為止，是遺留下許多創作的最後時期，不愧為徐渭的老成境界的時期。

這個編年的假設是從：

- 根據以上敘述的印的調查，可以把徐渭各式各樣的印和多種類的書畫分組。
- 群組間大致上的編年和同時期的並存關係中推演出來。

例如，群組A和群組F，青藤道士B17與B17a、袖裡青蛇B26與56、公孫大孃B29與65、文長B14與10、文長B9與28、青山捫虱B28與42、華暗子雲居31a與42、渭B7與1、徐渭B1與12、秦田水月B35與24、山陰布衣B22與61共十一個例子裡“大同小異的用印”，一個都沒有混著使用。

像這樣那麼多的印卻沒有和其他群組的印混著使用的原因，是不是印的保存管理十分良好，還是因為某種理由群組和群組並不同時存在呢？群組A與群組F（含有公元一五七七年北京故宮藏《寫花十六種（花卉十六種）卷》卷）的關係，可以解釋前者因為某種理由而不再使用或者完全是偽印。同樣的群組F和群組I裡大部分的印也是如此。也就是說：“群組(A)B 群組F 群組I”。可以推論出這幾個主要的印的群組之變遷。

從作品風格可以看出群組B非常氣盛的線條和群組I老成的線條對比鮮明，無法把兩者放置於接近的時間，像這樣把書畫的作風對照之後可以想見三個群組和大致的“早期 中期 晚年”相互呼應。

### （三）大致的書畫編年特徵

#### 1. 時間體系的展開

每一套印裡雖然有許多的印，但是卻不和其他印混著使用，乃是因為群組和群組之間並不同時存在，而這個編年是在這樣的假設下作出來。包含“早期：群組B 中期：群組F 晚年：群組I”這樣主要群組的變遷。這可以啟發我們“從寫實到抽象”的畫風而“從複雜化到單純化”、“生硬到熟練”這樣書風的演變。

#### 2. 同時期裡複數的群組並存

這個編年並不祇是直線的發展，其中包含有徐渭作品的多樣性。例如：書畫創作高揚期的中期，認真作風的群組D、和喜好用沒骨畫法具有獨特書風的群組E、和有活力的實驗作風的群組F，這些作風非常不同的群組同時並存，不是祇有時間軸直線般的單純的展開。

這個編年可以在複數群組並存之情況下包含徐渭作品的多樣性。

## 六、總結

以上利用徐渭書畫裡的自用印，利用數位畫像的方法對書畫印系統的調查所得到的成果之一部份。

各個印的特徵以“天池山人”、“公孫大孃”、“湘管齋”為例，說明明人用印的特徵“大同小異用印”，敘說印的缺角等與徐渭書畫編年有關的觀點。後半段關於印的群組化，對徐渭書畫印裡頭許多大同小異用印的群組化過程解說，並舉出了從A到J等十個群組例子。

本文圍繞在自用印的探討並敘說其中一部份研究成果。在徐渭書畫的基礎研究裡，目前尚未有這樣系統化的先行研究文獻，因此在這一點上別具意義。

不過，本研究的限制在於，在“印 - 書畫”相對的關係性下，有許多無法群組化的事物和一些例外。此外，可能還有一些遺漏或者錯誤，希望各界先進不吝指教。

今後研究的基調，以徐渭自用印為持續研究的基礎，進行徐渭書畫的綜合研究。以上提到目前無法做到的限制，相信在日後的研究過程中可以漸漸得到修正。未來在相關領域上也需多方面留意，並滲入書、畫等個別作品中討論。本文所無法充分拓展的，將在書畫自體的基礎下，進行更為具體且精緻的研究，為今後努力的方向。

筆者亦打算把本文作為博士論文“徐渭書畫研究”其中一章。

## 補遺

### 堀辰雄舊藏徐渭款“我思古人”印

日本著名文學者堀辰雄（1904 - 1953）遺愛的印裡，也有一顆刻有徐渭款的印石。

“我思古人”印  
（黑色石，縱長48毫米）



側款“己卯小春月天池”



“我思古人”原來是《詩經·綠衣》裡的句子。徐渭本人也有“我思古人等鴈行”（沈將軍詩，《徐文長三集》卷五，第一六一頁）這樣的詩句。側款的“己卯”、萬曆

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參照徐渭《畸譜》中“五十九歲。稍瘳。李子遂至自建陽，悅而起”可以看出是五十九歲這年紀。

公元一六二二年蘇宣



公元一六六七年王楫



公元一七一五年王翬



與徐渭時代接受的這類印例，可以舉出公元一六二二年蘇宣“我思古人來獲我心”、公元一六六七年王楫、一七一五年王翬等都有“我思古人”印。從“我”“思”字結構上看來，跟王楫的印有相似點，這較有趣。“思”“古”的第一畫用露鋒入刀，和明末蘇宣之印比較共通有拙氣。側款用徐渭書法風格入刀（雲南省博物館《水墨花卉》卷裡也有其他押印者不明的“我思古人”印）

筆者尚未見過明人擁有像這樣不定型印的例子，徐渭自用印裡也未曾發現過具有這種風格的印。不過類似這樣具有徐渭傳承風格的印石珍貴，至少在日本徐渭受容史裡算是一個證據。

這印石和一顆刻有明清名家側款的印一起放入印匣裡，聽說是二十世紀前半從廣東流傳過來。

相關資料：印譜《我思古人》（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堀辰雄夫人堀多惠刊）裡原鈐印所收，以及公元一九四一年堀辰雄三十六歲時的隨筆“我思古人”。

## 謝辭

最後，向以下各位前輩先進，在此獻上本人十二萬分感謝之意。

感謝把自己的研究時間割讓給在下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所長王耀庭先生、同研究員陳楷晉先生、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中國美術部書畫主任張子寧先生、芝加哥大學美術部馮良冰助理教授、筑波大學內山知也名譽教授、堀多惠子先生、東京國立博物館列品室長富田淳先生，還有實踐女子大學宮崎法子教授、柏林東方博物館魏志強館長、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史美德博士、紹興文理學院蘭亭書法藝術學院沈偉副院長、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小東副所長，以及澳門藝術博物館相關工作人員等，謝謝你們的幫忙。

以徐渭自用印所做的書畫群組編年圖

